

松潘草地日记里的精神密码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刘凡

档案启示

初秋华北，热气未消。这天，第82集团军某旅某连官兵整齐坐在帐篷中，目光聚焦在屏幕展示的照片上。

“十七师、模范师因西倾寺轮番出发后，即大部无粮，沿途亦无补充，尽食野菜、皮革，致部队极疲困，减员两师达二百人。”

写下这段文字的，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。1936年7月，红二方面军作为3个方面军中最后通过草地的部队，向着被称为“死亡陷阱”的松潘草地出发。

这是一条注定凶险的路。行军前，红二方面军官兵平均每人仅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，远不能满足需要，进入草地数日后便彻底断粮，野菜、草根、皮带都成了果腹之物，而松潘草地夜间气温低，昼夜温差大，风雨冰雹常常轮番袭来，沼泽泥潭又暗藏杀机……这样一段极端艰险的路程，却被张子意用寥寥数语定格下来——

7月14、15日，我军在绒玉休息筹粮。14日我模范师及十八师均到达绒玉。筹粮无成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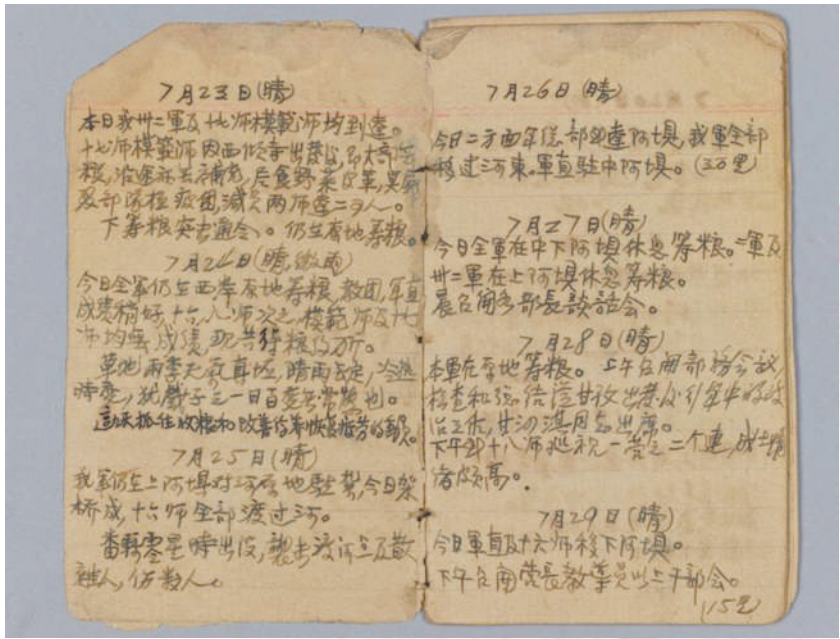
7月21日（雨），连日天雨，粮缺，帐篷（篷）少，掉队死亡现（象）极严重。

7月24日，草地雨季天气真坏，晴雨无定，冷热时变，犹戏子之一日百变无常态也。

8月1日，草地天气寒冷，虽入三伏，亦不能离皮大衣……

食难！宿难！行难！

“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在看不到尽



头、随时可能倒下的最难的时候，依然相信组织、相信胜利。”讲到这里，连队指导员邓峰的声音略有颤抖。风雨不绝、缺乏补给，连队官兵不禁想起了前些年参加抗洪抢险的情景——

那次，驻地遭遇特大暴雨。该连作为先头救援力量，接连克服障碍遍地、物资紧缺、夜间不便通视的困难，打通了外界通往灾区的第一条生命线。接连几天，官兵只能在潮湿的地面上休息两三个小时，有的起了满身疹子，有的双脚被水泡烂，有的双手磨出血泡，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。

“越是艰险志越坚！”在抗洪抢险一线，连队官兵叫响战斗口号，圆满完成

救援任务。看着挺直了脊背的官兵，邓峰语气坚定：“今天我们传承长征精神，不能只比谁更能吃苦，更要看任务压茬时信念有没有松、组织观念有没有弱、战斗意志有没有减退。”

听着指导员的话，上等兵马嘉豪内心深受触动。前不久，连队组织负重徒步行军适应性训练，行至一半，他便感觉双腿似灌铅般难以挪动，那时他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红军长征能走完两万五千里，我难道还走不完这一段拉练路？于是重新振作精神，跟上队伍。

此刻再想，他有了更深的体会：“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，不是靠一句‘坚持’

熬出来的。支撑他们的，是‘革命理想高于天’的信仰，是‘跟着走’的纪律，是‘与同志彼此扶持’的团结。”

这份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，就这样悄悄地浸润这个连队的官兵。

“我要用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付出克服面临的各种问题，如果思想上先投降，连平时10%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。越难做的事，越值得坚持。”课后，二次入伍的战士田合圆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。

田合圆很珍惜再次入伍后的时光，有任务争着上，遇困难不气馁，虽然来到连队不久，但他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，得到大家的肯定。

如今在这个连队，像田合圆一样的官兵越来越多。以这本长征日记为动力源，“学长征精神，做红军传人”不再停留在口号上，而是融入每一次急难险重任务、每一场练兵备战考核。

前不久，该连高强度完成多个演训任务后，奉命参加某综合演练行动。“任务压茬推进，工作接连展开，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过退缩。”中士张飞飞说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，是时任连长张楠急性病发作，即便疼得满身是汗、嘴唇发白都没有后撤，而是始终和连队官兵坚守在任务一线。

“先辈们在生死绝境中立起的旗帜，传到我们手里，就是再难也要顶上去。”张楠说道。这本泛黄日记里的精神密码，早已从松潘草地传遍大江南北一座座军营，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的手中接续传承、生生不息。

左上图：张子意随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期间写下的日记（部分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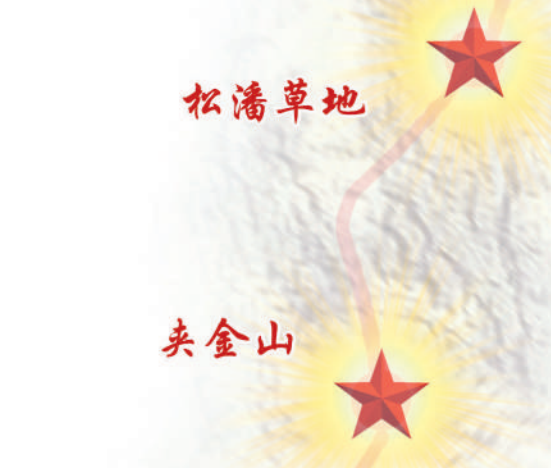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图片

一步一喘向着山顶攀登。风雪之下，步履维艰，但没人退缩，没人畏惧。有的只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战胜绝境的信心。

这段历史启示我们，强大的精神力量，能够冲破客观环境的桎梏，于绝境之中迸发磅礴力量。如今在强国强军、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，越是任务艰巨，越需要我们直面各类风险挑战，坚定信念、凝聚力量、攻坚克难，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（周末）

铁血丹青



红军过雪山（油画） 艾中信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

我读长征

前段时间，在红蓝对抗演练复盘会上，我们连挨了批评。说起来有点憋屈——夜间无光驾驶、战术隐蔽这些课目都顺利过关，最后扣分的原因，是部分官兵在车队行进过程中，未按规定全程用密语通信。

此次演练明确要求，车辆机动期间必须全程密语对讲，禁止明语通话。可有些战士觉得野外空旷，没什么敌情，偶尔用明语传个口令影响不大。正是这种“小事无所谓”的心态，导致连队演练丢分，也暴露出连队纪律意识弱化、执行规定打折扣的问题。

那天晚上，这件事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。不知不觉想起了连队前身随红军长征、在田间留下“割麦证”的故事。

1935年7月，红军抵达松潘县毛儿盖镇藏村。历经长途转战，部队粮草消耗殆尽，战士们靠挖野菜、煮皮带充饥，前方就是茫茫草地，筹粮成为穿越

草地的关键前提。可当地藏族群众受到敌人谣言蛊惑，全都躲进了深山，成片成熟待收的青稞田无人看管。

身处绝境、无人监督，红军却没有动群众的粮食。上级要求，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，确需收割必须精准登记、留好凭证，严禁损毁未成熟作物。红军战士以班排为单位，逐田计量登记，每收完一块田地，就将一块“割麦证”立在田头。木牌上郑重写明，群众归来后可凭此兑换等价的银元、茶叶等物资，还特意留出空白，供百姓自行核对收成、补填数量。各级纪律检查队逐田核验，绝不占群众半分便宜。

荒山野岭，没有监督，没有旁证，先辈们靠的是深入骨髓的纪律自觉。红军之所以能在绝境中发展壮大、赢得民心，靠的就是这种无人监督时依然坚守纪律的作风。

对比先辈，反观当下，我们的物质条件好了很多，但部分官兵的纪律意识反而有所下降。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，上级检查时落实纪律规定就严格些，无人督促时就变通放松。比如日常查哨中，曾发现个别战士为图方便，不按规定当面交接口令，直接用对讲机明语询问。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，实则暗藏隐患，真到了战场，一处细节

松懈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

除此之外，连队官兵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今年8月，全连备战上级卫勤集训，20余名老兵即将退伍，无法参加正式集训，却没有丝毫松懈。日常训练中，他们主动充当卫勤演练模拟伤员，反复配合伤情处置训练；营区执勤人手紧张，他们主动申请补岗，坚守哨位。离队前最后一个周末，他们集体找到连队干部，提出要站好军旅生涯最后一班岗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军人本色。

两种状态、两种选择，让我对纪律的内涵有了更深刻体会。纪律不是挂在墙上的条文，而是刻在心里的准则；

英雄后人话长征

人物简历

王玉清，贵州威宁人。1935年参加红军，随军长征，1940年入党。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新中国成立后到原福州军区任职，是经典课文《金色的鱼钩》原型人物之一。

秋风吹来，天气渐凉。望着窗外在风中挺立的那片草地，我不禁又回想起父亲。

5年前，我们为他庆祝了百岁生日。那时父亲身体依旧硬朗，虽然早已银发如雪，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夸他精神矍铄的。那天父亲兴致很高，同前来祝贺的战友、同志们聊了很久。其间，他反复跟大家说了一句话：“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”

父亲是长征路上的“红小鬼”。他出身贫雇农，吃尽了旧社会的苦。1935年，红军路过黔西，父亲见红军搞土改，帮农民翻身，就参加了红军。因为年龄小，他被安排负责收发电报的工作。

一入伍，父亲就立了件“大功”。1936年，红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乌蒙山回旋战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敌人急了，密电要在金沙江一线布下重兵，誓要堵住红军的北上之路。

巧的是，这封密电被我军截获。可当时我军正在行军，无线电台离指挥部还有段距离，如何送报才能不被敌军发现？电台领导最终派出父亲这位“红小鬼”，让他换上平民的服装，徒步跑去给指挥部送信。父亲最终出色完成任务，部队得以趁着金沙江防务空虚之机，再度调转方向，从石鼓巧渡金沙江，跳出了敌人的圈套。

当然，他更广为人知的故事还是小学课本上的《金色的鱼钩》，课文里那位用缝衣针做成鱼钩的老班长的原型之一正是他——

红军北渡金沙江后，继续北上。在荒无人烟的广袤草滩，无法征集足够的粮食，战士们断了粮。怎么办？只能靠挖草根，甚至煮皮带果腹。当时有位炊事班长看到父亲饿得实在走不动，就将自己的粮食袋翻个底朝天，使劲抖了抖，把最后一点粮食全给了父亲。

父亲问：“粮食都给了我，班长你怎么办？”老班长答：“走一步看一步吧！你别考虑我，自己要坚定走下去。”后来两人走散了，父亲便学着老班长那模样，照顾身边战友。

一天，父亲坐在一处水沟旁休息，忽然看见水面泛起波纹，不由心中大喜：有鱼！没有力气进水沟捉鱼的父亲，突然想起别在军帽上的两根缝衣针。他灵机一动，将针烧红后弯成钩、拴上线，竟钓上来几条拇指长的小鱼。像“得到宝贝一样”的父亲，把煮好的鱼汤分给身边的战友。恢复一点体力后，他们相互扶持，继续向前走……事后，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，支撑他们走出草地。

“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，闪烁着灿烂金色的光芒！”每次重读《金色的鱼钩》，想象着父亲和战友们长征中艰苦跋涉的场景，我就对父辈们多了一份敬重。

父亲生前，为我们定下3条家规：一是不许我们到他任职的部队服役，二是不许我们坐他的公务专车，三是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办任何私事。小时候我

们想去公园看菊花展，和父亲“撒娇”想要坐专车去，没想到换来父亲的“冷脸”：“车是组织因我工作需要配备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能私用！”

父亲的晚年，似乎有一种“执着”。每到建党、建军这些纪念日，他会亲自写稿，到部队给官兵们讲历史传统。离休后，他把自己关进书房，奋笔疾书。时间久了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在写革命回忆录。我劝他，年纪大了歇一歇吧，可他说：“我要写，得给后人留下那段真实的革命历史。”

父亲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能等到建军百年。父亲常说他是1921年生人，与党同庚。他已经迎接了建党百年，下一个人生目标是迎接建军百年。但我想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一定不会以他的“遗憾”为意，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长征路上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强大。

（卢永好、本报记者王德襄整理）



右图：红军筹粮时留给藏族同胞的“割麦证”。

资料图片